

儿童文学叙事中的权力与对话

——一个后经典叙事学视角的研究

金莉莉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 北京 102249)

[摘要] 儿童文学是作者(成人)与读者(儿童)对话交流的中介, 儿童文学本身所具有的跨学科的文化特性使文本与存在的外部语境形成了密切联系。因此要研究儿童文学的叙事特色, 必须结合文本语境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的后经典叙事学理论为重新审视儿童文学叙事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儿童文学的特殊性使作者与读者形成复杂的权力关系, 同时, 作者与读者、成人与儿童又努力在这种权力关系中寻找不同的对话途径和表达方式。这种复杂的叙事语境直接决定了儿童文学文本的叙事特色。

[关键词] 儿童文学; 叙事; 语境; 后经典叙事学

[中图分类号] I207.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06)06-0109-04

Power and Dialogue in the Narration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 Perspective of Postclassical Narratology

JIN Li-li

(School of Humanities,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2249, China)

Abstract: Children's literature is the bridge for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author and reader. Text has close relations with context due to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ombine text and context to study the narrative feature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Postclassical narratology rising in 1980s in western world provides solid base for reexamining the narration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The author insists that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s of power between author and reader come into being for the particularity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the complex narrative context directly determines the narrative feature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s text.

Key words: children's; literature; narration context; postclassical narratology

儿童文学最受影响的因素莫过于社会对儿童所扮演的角色提出了太多要求: 儿童应学什么和怎样学, 儿童的责任和权益, 和儿童读物应有的内容。而儿童文学的内容往往会受成人影响, 这使得这种特殊的文学形式永远存在一个争论性的问题——作品里到底应该有或应该没有些什么内容。这是有关儿童文学较为普遍的思考, 由此可以看出, 儿童文学比其他文学样式更加强调文本功能和读者对象思维、年龄的选择, 在其创作中带有较多的文化因素, 比如成人对儿童特点的想象与界定、对儿童主体性建构的考虑等等, 而这又直接规范了儿童文学文本的叙事方式。

因此, 要考察儿童文学的叙事特色, 仅仅局限于文本内的语言研究是无法找到导致这种叙事产生的根源的, 儿童文学本身所具有的跨学科的文化特性使文本与存在的外部语境形成了密切联系。也就是说, 语境是形成文本叙事特色的原因, 必须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更深入地探究儿童文学的特质。

当叙事理论发展到后经典叙事学阶段, 对文本的分析便突破了传统叙事学过于科学和近乎残酷的解构, 开始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融入外部语境中的文化因素对文本进行研究。后经典叙事学将文本内外结合的研究方法正切合了本文对儿童文学的思考。

一 后经典叙事学的研究方法

叙事学理论是研究叙事性文本的重要方法,但以西方20世纪80年代以前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为基础的古典叙事学过于注重对文本的条分缕析,企图寻找所有故事共通不变的结构规律,而割断了文本与历史及社会的联系,叙事学家们往往关注叙事作品的共性而忽略了作家的艺术独创性和丰富性。

经典叙事学的这种弊端在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后经典叙事学理论那里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超越和发展。六七十年代以后,叙事学也面临着精神分析学说、阐释学、接受美学、女权主义批评、意识形态理论等各种学术思潮的冲击,叙事学家们开始在理论研究中反思、发展,不断注入新的因素。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在文本研究中开始注重文体外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但一味进行政治批评和文化批评而忽略文学的美学规律将必定给文学研究带来灾难,于是叙事学重新被关注,“他们再度重视对叙事形式和结构的研究,认为小说的形式审美研究和小说与社会历史环境之关系的研究不应当互相排斥,而应当互为补充”^{[1][P13]}。文本的外部研究恰恰弥补了经典叙事理论的不足,叙事学开始走向更为复杂、全面的跨学科研究之路。

因此,后经典叙事学重新审视或解构了经典叙事理论的一些概念,逐渐改变只专注于文本内部结构的研究模式,有意识地从其他学术思潮中吸收有益的分析模式和独特视角,开始注重读者和社会历史语境的分析。

二 儿童文学叙事研究的后经典叙事学视角

后经典叙事理论对文本叙事语境的强调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给本文探讨儿童文学问题提供了重要支撑。

如果将儿童文学文本看作是作者与读者交流的中介和结果,那么这次对话同样不会抽象进行,而必然存在于作者与读者组成的交流语境——一种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外部环境预示着双方的身份和地位,决定了二者对话的方式:谁在说,为什么说,怎样说,说了什么或没说什么,这便形成文本内部的叙事方式。因此,与文本叙事直接关联的是文本外作者与读者的交流语境,在儿童文学中,即是在一种社会文化情境中成人与儿童的复杂关系,有权力的生

成,也是对话的表达。

(一)儿童文学的叙事语境:成人与儿童权力关系的生成

儿童文学范围中的主要部分是成人创作、儿童阅读的文学,其所负载的功能不仅仅是纯粹的美学精神,而且被规范为“教育功能、美育功能、娱乐功能、再现人生”等多种功能的统一,作家对童年的重塑也“意味着‘在更高的阶梯上再现童年的真实’,意味着对童年的理性回顾与提升,其中已融入了作家大量的人生阅历与思悟,融入了大量的社会与历史的深厚意蕴”。^{[2][P67]}可见,“再现”童年的叙事内容既积淀有社会历史的因素,也受制于这些文化意蕴,它关系到成人以怎样的态度创作儿童文学。

在国外对儿童文学本质特色的讨论中,也有着类似的论述,比如澳大利亚儿童文学理论家约翰·斯蒂芬斯认为,儿童书主要处理的是“关于人们在社会族群中如何生存、互相影响并铸造自己身份的事”,“儿童文学的生产和传布总是委付于特定的价值和程式。它致力于发扬成熟、自由和卓越的品质”。^{[3][P54]}

这些论述表明,儿童文学需要承担太多的责任和意义,因为文本读者还处于童年——一段被认为是不具备“成熟品质”、必须接受知识以及道德储备的时期,他们的文学在主题和叙事上应该是区别于别的文学样式的。于是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演变为成人与儿童的关系,无论是成人在文本中对童年和儿童的想象以故事形式加以体现,还是成人作者理所当然对儿童读者担负的“道德义务”和“品质塑造”,都显示出作者与读者、成人与儿童之间一种复杂的关系。

当同一种资源的分配不对等,且一方对另一方形成依赖时,权力就会产生。成人与儿童永远是儿童文学文本中最本质的两极。儿童文学中的“儿童”由于缺少“成熟、自由、卓越的品质”,以及正处于完成社会化的学习阶段,而通常被认为还不具备“准确”表达自己的话语能力,成为了被“说”的对象。“儿童文学”是为“儿童”创作的文学,而儿童的不在场和话语能力的缺失,又无疑使他们的童年生活和精神世界具有了被成人无限想象和言说的可能性:或写实或魔幻的校园小说、充满幼儿朝气的儿童诗歌、有着无边幻想的童话等等。很显然成人在知识、教育等方面的优越性使他们在儿童文学这个领域中占据了较多的资源,同时儿童又是以进入成人世界为成长目标,于是成人在儿童文学中对儿童的想象

性言说方式就成了一种“合法性”规范中获得的权力。

在这种情况下, 儿童文学文本作为成人与儿童对话交流的中介, 则是在二者的权力关系中产生的, 同时, 这种关系也获得了丰富的社会文化因素。在对儿童文学从概念到叙事文本的考察中, 我们看到: “儿童文学”的界定、写作以及评论、出版等话语权力始终掌握在成人手里, “儿童”处于被“说”、被形塑和被假设的地位。对于一个已经远离而且不可能再回去的陌生的世界, 解读的方式只有假设与想象。“成人建构出‘去掉了威胁性的童年意象’, 然后我们把建构出来的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呈现给孩子, 好说服他们的生活的确是我们替他们想象的样子”, “因此儿童文学代表了大人殖民孩子的大规模努力, 让他们相信他们应该变成大人希望的样子, 并且让他们对于本身所有不符合大人模式的部分感到惭愧”。^{[4][P104]}可见, 想象就是一种体现权力关系的意识形态, 它使成人有权从宏观和微观上将叙事内容纳入到成人世界规定的体制规范中来, 他们能选择有利于表明自己意识形态的“合法化”的儿童生活和精神内容、展示人类获得自我的成长经历, 同时虚构故事以帮助儿童从角色和情节中学习认同自我身份、完成社会化的自我建构。

文学叙事建构了想象中的成人与儿童的合法秩序, 又反过来规范了文本外二者的互动关系和行为规则, 通过文本成人强化自己的权威地位, 儿童也在叙事中明确了成长目标, 顺利进入由成人确定的社会体制。于是, 文本外的权力关系与文本叙事形成无法分离的因素。

法国思想家福柯极力强调作者的功能就是话语生产, 这种生产被某种复杂的权力关系制约着, 使得文学与体制和意识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事实上儿童文学的产生和存在方式同样与体制密切相关, 并且通过作者(成人)与读者(儿童)的关系体现出来。

因此, 本文认为, 成人与儿童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及运作方式构成了儿童文学文本的叙事语境, 也是文本产生的重要前提, 对文学内部的研究无法回避对叙事语境的探讨。

(二) 儿童文学叙事: 权力关系中的对话表达

儿童文学遵循文学领域的基本美学和创作规律, 但叙事语境的特殊性使作者与读者具有不同于成人文学的互动关系, 这直接决定了文本产生方式、叙事技巧和阐释的特性。

同时, 儿童文学文本叙事涉及的是作者与读者、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事者和叙事接受者三组对应关系, 叙事就在这些言说主体之间以及文本中的人物或显在或潜在的对话中完成, 他们形成了一种双向叙事和多方叙事的局面。而文本外成人与儿童间的权力关系又直接决定了上述几组言说主体在文本叙事中的交流方式。文学理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重点研究了这种对话关系, 认为整个文本就是说者和他者对话的集合体, 而每个人的声音又都是由社会性的他人话语组成的。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因同时关注语言中的个性与共性而成为一种超语言学, 同时又与话语权力的论述有暗合之处。比如布迪厄认为, 任何一句语言都不是简单的对话行为, 而是预先假定了合法的言说者和接收者, 是关于具有特定权威性的说者和认可这一权威地位的听者之间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

事实上, 后经典叙事学常常借用巴赫金的超语言学分析方法探讨文本内外的叙事特征, 而在儿童文学叙事中, 作者(成人)与读者(儿童)恰恰也是在权力关系中凸现出了对话的努力。巴赫金对作者与读者对话性的强调揭示出了“作者与交流对象的哲学上的本质——相互补足”^{[5][P29]}。本文认为, 儿童文学叙事中这种本质上的对话性不仅是作者与读者间的相互补足, 对对方资源的相互借鉴, 而且是在一种权力话语的框架下成人对儿童意识的努力凸现, 或者“代替”儿童建构理想的童年成长方式, 或者帮助和“代表”儿童展示自己的精神世界。于是无论成人作者叙事如何复杂, 意蕴如何深邃, 或者如何超出儿童的心理“主体结构”, 读者却总能从这些优秀的文本中找到能够达成对话的因素。

那么儿童文学叙事中为什么会形成一种独特的对话因素? 文学是一种使社会准则内在化的有力方式, 通过讲述别人的故事承载意识形态, 使读者站在这种主体位置上认同故事和人物, 并进一步认识自我。比如关于童年和童年的发展阶段、关于性别、年龄、文化、传统、交往和各种道德判断、价值观等等, 所有成人认为有利于促进儿童成长为像他们一样“合乎规范”的个体的观念, 都以知识的形式传达给儿童, 文学就是这种知识的载体, 但它是以更加有趣和充满美的魅力的形式让儿童愿意接受规范。

因此, 儿童文学叙事一直在为交流双方提供一种主体的属性(即身份的归属)地位, 文学是对自我以及自我和社会关系的一种重新叙述, 儿童文学叙事虽指向童年世界, 但实际体现的却是成人对社会

秩序、结构关系的重新描述、想象与建构,作者在不同的角色、个性或群体属性中也描述了自己。虽然文本再现的是不同人物、甚至儿童、动物或其他无生命物体的行为,但从角色努力顺从社会规范和对自我的期待中,在虚构世界建立的主体间的关系模式中,作者确立并强化了自我认识,并力图在叙事中通过聚焦、对话、声音、结构等等设立一系列主体位置来表现出这种主体性。

因而作者(成人)与读者(儿童)主体性的确立是相互建构和塑造出来的,这使二者形成了不可避免的对话关系,而且具有丰富的话语内涵。

叶圣陶的《稻草人》被认为是中国儿童文学走向现实主义道路的开篇之作,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文本叙事的主题、急切的情感表达其实是具有相当多的成人话语的。那么如此叙事的《稻草人》是否因为过多的成人强势话语而失去了“对话”的表达呢?本文认为,《稻草人》叙事语境中的权力关系恰恰体现了那个时代作者谋求与读者对话的努力。

在《稻草人》时代,作者强烈的情感表达和焦虑的国家与民族情结使成人表现出急于引导儿童走向救国之路的强势态度,历史文化语境迅速改变了成人对儿童的未来期待,此时儿童观已经走出“儿童本位”的层面,而走向现实教育和引导儿童成长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之路。这就是《稻草人》产生的叙事语境:成人以更强势的权力话语想象理想的童年,并为儿童预设具有强烈时代感的成长道路。所以在《稻草人》叙事中作者与读者的“对话”实际体现为:作者(成人)在权力话语中为儿童代言,为其建构新的童年成长方式。成人在叙事中极力塑造自己的“引导”身份,而儿童则在《稻草人》叙事方式的接收中,也不自觉地认同“被引导”的角色和地位。

但对于给叶圣陶创作《稻草人》提供直接启发的王尔德的《快乐王子》来说,叙事方式却更多地显示出儿童的精神特征,比如故事结尾的乐观处理(快乐

王子的铅心被天使带到天国)、叙事修辞中的隐喻与幽默等等,常常被认为更贴近儿童的审美情趣和接受心理。而这正是因为《快乐王子》的叙事中,作者与读者采用了不同的“对话”方式,不是成人借用强势话语在叙事中直接为儿童预设成长道路,而是作者顺应该读者的阅读体验,始终在俯身寻找与儿童读者平等沟通的途径。

因此,语言的对话性质实际上也暗含着具有不同权力关系的声部之间的交流与争辩,尤其是在作者与读者、叙事者与叙事接受者、人物之间以及人物内心,其话语既包含了双声以及复调的语体模式,又体现出声部主体间互动的复杂关系,谁的声音、谁在听、说的目的以及效果成为文本叙事的重要因素。儿童文学作者(成人)与读者(儿童)权力关系的复杂性,导致了叙事中不同的对话表达方式,也形成了不同的叙事特色。

儿童文学作为成人与儿童对话交流的中介,是在二者的权力关系中产生的。同时,作者与读者、成人与儿童又努力在这种权力关系中寻找对话的途径和表达方式。这也构成了儿童文学文本复杂的叙事语境。后经典叙事学对文本叙事语境的重视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为重新审视儿童文学的叙事特色提供了极好的研究思路。

[参 考 文 献]

- [1] 申丹. 新叙事理论译丛·总序[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2] 蒋风. 儿童文学原理[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8.
- [3] (澳)John Stephens. 陈中美, 张嘉骅译. 儿童文学与文化研究[J]. 儿童文学学刊, 2003, (9): 52-60.
- [4] (加)培利·诺德曼著. 刘凤芯译. 阅读儿童文学的乐趣[M]. 台湾: 天卫文化图书有限公司, 2001.
- [5] 董小英. 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4.